

举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历史演变与重大作用

■ 郭欣

提升。因此,举国体制既体现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国家宏观调控理论两种经济学思想的融合,也包含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及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结合中国情境,对西方前沿理论的运用与创新。

二、历史演变

1. 举国体制的国内历史演变。本文通过总结 1949 年至今中国的发展历史, 可以把举国体制的发展大体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是传统举国体制阶段(1949—1977), 新中国百废待兴, 实行举国体制集中全国力量用于发展工业, 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这一阶段, 我国成功研制出了核武器, 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体系。二是举国体制转型过渡阶段(1978—2014),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后, 明确提出了以国民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发展导向, 通过统筹协调全国资源, 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优势, 快速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获得了大幅提升。三是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阶段(2015 年至今), 在这一阶段突破重要核心技术成了我国实现发展的关键, 而举国体制就是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阐释, 我国在发展中充分结合国情、勇于探索创新,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真正做到了“全国一盘棋”。

2. 举国体制的国际历史演变。举国体制非中国独有, 西方发达国家科技研发与专利技术也离不开政府的投资扶持, 前沿重大技术成果依旧掌握在政府手中。例如,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日本已经制定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赶超计划来应对日美贸易战; 到 21 世纪, 日本政府在 2015 年发布了机器人扶持项目, 通过设立 1000 亿元的专项基金推进国内机器人研发。同样的,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启了“曼哈顿计划”, 2017 年美国又公布了 DARPA 电子复兴计划(ERI), 政府在上述重大计划中起到了决策、协调、项目评估等作用。德国人于 2006 年提出了国家高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于 2013 年又提出了“工业 4.0”的发展模式, 包括其 2018 年颁布的“高科技战略 2025”。可见, 一向以“自由化”为口号的西方发达国家, 在国家

重点项目上仍要依靠政府主导。

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 举国体制是一个任务体系和制度安排, 要实现重要任务就需要突破现行运行机制。对于我国而言, 虽然举国体制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不同, 但无论处于哪个历史时期, 都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 统筹规划战略格局, 在中央的集中统一带领下形成统筹协调资源的运行机制, 发挥协同精神, 推进重大项目的建设运行。

三、重大作用

1. 聚八方之气, 赋能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习近平在院士大会上强调“重要核心是买不到、要不到、讨不了”的。技术的研究需要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资金统筹配置工作, 全面规划, 统筹兼顾布局。作为举国制度的重要部分, “点将配兵”是一种典型的人才、资源集中型研发模式, 体现了“大科学”的特色, 有利于优化技术关键技术突破格局、促进技术突破方法向体系化格局构建过渡, 从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降低“卡脖子”风险。

2. 借八方之力, 保障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中国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 为了补齐民生领域短板, 实行举国体制对于推广扫盲运动、阻隔疫病传播、普及农村医疗保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是行之有效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民生问题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只凭借市场作用不仅无法解决民生问题甚至会激化矛盾, 为了应对新的社会形势, 必须依靠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 革新现有的举国体制, 切实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运行中出现的短板缺陷, 推动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稳步提高, 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3. 集万众之心, 支撑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举国体制的根本出发点是以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我国实行举国体制把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作为根本目标, 具有国家利益至上特点。这种我国权益至上化体现了举国体制的全域性、战略地位、紧急性。通过举国体制能够推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使得我国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如何预防青少年近视

■ 赵海燕

病变或者视网膜脱落等, 病情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失明。近视手术是治疗近视的常见手段, 通过切削角膜的方式降低近视度数, 但近视所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玻璃体改变风险较高。高度近视可能会诱发的各类风险也没有减少。

二、如何防治青少年近视

长期过度使用眼睛、阅读距离过近、错误的读写习惯以及长时间接触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都可能导致视力下降。此外, 很多父母普遍认为自己是患有近视, 才将其遗传给孩子。然而, 目前对于近视是否具有遗传性以及具体的遗传方式尚不完全明确, 更重要的影响来自社会环境和行为习惯。相关研究显示, 父母对孩子视力的关注程度对孩子未来是否会发展为近视具有显著影响。例如, 在学龄前就开始关注孩子的视力发育相对于上学后才开始关注视力的家庭, 前者发展为近视的孩子

数量明显较少; 父母经常使用电子产品的孩子相比于父母较少使用电子产品的孩子更容易发展为近视。因此, 父母在教育 and 约束方面的作用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与孩子相处时的行为习惯。同时, 父母应确保孩子拥有足够的睡眠, 这样可以减少孩子发展近视的风险。

教育者在改革过程中, 应当改变以成绩论好坏的现状, 充分结合双减政策, 缩减学生大量用眼的机会, 也要控制用眼的强度, 将视力健康也要融入素质教育中, 学校积极实施课改, 提升每个学生的体育意识,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户外活动中。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及总体近视率、体质健康都应当是教育考核的指标, 针对青少年视力健康问题的地区, 也要引起重视, 共同对近视问题进行思考及处理, 全面防控近视, 提升全民眼健康。(作者单位: 邹平市中医院)

伊甸园的沉浮: 论鲁滨孙的性格困境与抉择

■ 何八骏

空地种出了一片森林, 那些“生存财富”则被藏得更加隐蔽。虽然这一逃避的表面是为了躲避野人的袭击, 但是能够看出, 鲁滨孙这种躲避外界危险的办法, 也正是他为自己利益的护航的一种手段。

二、伊甸园的道德与宗教困惑

在该小说的研究中, 也有学者另辟蹊径, 从英美文学田园批评理论入手分析《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多层次田园理想: “鲁滨孙在荒岛上塑造了一个充满着秩序与伦理的田园世界, 田园的和谐也反过来对鲁滨孙施加着影响。”这与鲁滨孙在荒岛上阅读的《圣经》中的“伊甸园”不谋而合, 因此, 在研究中笔者用“伊甸园”去代替田园理想, 似乎能更好地解释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宗教话语。

在 18 世纪的英国, 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开始摧毁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不断地把人的关系异化。从世俗嘈杂的资本主义世界, 走向纯真的田园风景, 代表的正是大众心理对于原始美好的憧憬与渴望。当鲁滨孙决定用新的思想修炼自己时, 面对去留的问题时, 他也产生了另外一思考虑: “即使世人不要我, 但失去上帝的宠幸和保佑, 这种损失不是更大吗?” 这个荒岛虽然困苦, 但“也许比我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在宗教的调和下, 原始的荒岛形成了一种风景, 让鲁滨孙的内心能够在其中和谐并置。

可也正是在这样的“伊甸园”式的荒岛上, 鲁滨孙也产生了个体的道德和宗教困惑。鲁滨孙作为一名基督徒, 需要面对严苛的清教道德, 那就是抛弃私欲以及抗拒诱惑。因为清教徒需要不停地忏悔, 不停地叫问自己的良知。当鲁滨孙在荒岛上发疟疾的时候, 他才想到了上帝并开始了反省, “八年来, 我一直过着水手的生活, 染上了水手的种种恶习。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信仰上帝, 也没有反省过自己的行为。” 经过种种变故, 鲁滨孙他自己终于意识到了戒除贪欲的必要性, 可是他却没有真正地完自我规训, 他依旧虔诚地恳求上帝把自己从荒岛上拯救出来, 并且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十分地看重。当他发现沉船上有一个钱箱时, 他不屑地表示这些钱并没有什么用, 但另一方面, 他却还是把这些意外之财把钱一一搬回了山洞, 并像以前一样妥善收藏好。遇到“星期五”后, 鲁滨孙对他“主人”, 并告诉他这是他的名字, 并逐渐产生了主人意识, “我觉得自己已有了不少百姓, 自己犹如一个国王。” 这显然违背了自己信奉宗教的戒除贪欲之规, 前者的祈祷似乎也带上了一种功利性。因此有学者认为: “《鲁滨孙漂流记》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

■ 康莉莉

艾滋病, 它的全名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是由人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该病毒是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 CD4+T 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目标, 从而破坏人的免疫系统, 最终使免疫系统崩溃, 使人因丧失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而发病并导致死亡。艾滋病病毒主要存在于感染者和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中, 唾液、眼泪和乳汁等体液中也有。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和母婴传播, 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平均 9 年, 可短至数月, 长达 15 年。艾滋病已被列入中国乙类法定传染病, 目前尚未研制出根治艾滋病的特效药物, 也没有可用于预防的有效疫苗。感染艾滋病会对工作、就业和家庭等方面带来较大影响, 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并需终身服药治疗。因此, 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有效预防艾滋病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1985 年, 一位到中国旅游的外籍人士患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后很快死亡, 后被证实死于艾滋病, 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如今艾滋病在全球肆虐, 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 全球关注艾滋病问题, 加大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 重视艾滋病人的治疗, 在不同群体之间, 陆续产生强烈的影响。自艾滋病出现, 我国艾滋病病例逐年增长, 感染人数快速增多, 流行区域也逐渐扩大。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 我国感染艾滋病的主要人群为中青年, 其中绝大部分为青年学生。学生为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很容易成为受害者, 危害校园稳定。

根据山西省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来看, 当前山西省的艾滋病流行情况位于全国第 23 位, 截至 2022 年底, 现有艾滋病感染人数 12768 例, 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有 3523 例。从地区分布情况来看, 运城城市位于全省第一, 太原市第二, 临汾第三。根据艾滋病传播途径来看, 其中异性传播占比 54.6%; 同性传播(男男)占比 41.2%; 母婴传播的比例仅为 0.2%; 注射吸毒传播的概率仅为 0.1%; 其余传播途径占比 3.9%。其中, 学生占比高达 18.9%, 可见, 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并不充分。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为性传播, 尤其近年来存在着越来越多男男同性别学生相恋的情况, 在男男同性恋中, 大部分同学对艾滋病防治知识存在缺失, 发生了无保护(不使用或不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 使得无保护的男性性行为成为青年学生中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因此, 让更多青年学生了解艾滋病, 正视艾滋病, 增强同学们知艾、防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成为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正确了解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 针对山西省某地区青年学生展开了一系列问卷调查, 问卷主要针对学生对待艾滋病的态度、知识获取途径和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三个方面展开调查。从调查结果分析看出, 学生们获取艾滋病知识主要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书籍以及报刊来获得, 而学校教育、社会宣传以及家庭教育目前并未发挥载体作用。通过此项调查, 了解到目前青年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

比较局限, 缺乏防范艾滋病的自我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也相对较弱。调查显示, 接近三分之一的学生都存在婚内调查的情况, 而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为性传播, 致使该群体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逐渐递增。可见, 加强艾滋病教育成为摆在青年学生教育中的一大难题。

那么, 如何更好地对青年学生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展开宣传教育呢? 可以从学校教育和社层面两个方向入手。首先, 针对学校教育, 学校要明确健康教育课程, 对学生实施脱敏教育, 加大性教育知识的普及力度, 将性教育纳入学生必修课程中, 并结合心理卫生教育以及道德伦理教育, 培养学生正确、健康的性观念。新生参加入学教育期间要积极学习和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识, 主动加入学校防艾志愿者学生社团。最好能在学校内设置艾滋病检测点和咨询服务, 让学生可以随时接受检测和咨询服务。教师可以开展多元化的专题教育, 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对艾滋病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还可以借助 12.1 世界艾滋病日、6.26 禁毒日等与预防艾滋病有关的节日, 以主题班会、教育宣传栏等方式, 健全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此外, 也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配合当地疾控中心开展艾滋病宣传, 提高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与态度。其次, 在社会层面上, 高校可与疾控部门或医院签订协议, 安排专业人士到学校开展知识讲座, 组织开展艾滋病检测。

总体来说, 青年学生作为艾滋病感染与传播的主要易感人群, 近年在全国呈现出上升趋势。青年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 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与技能。洁身自好, 拒绝不安全性行为, 不要与不知道艾滋病感染状况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 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性行为时一定要使用安全套进行保护, 要选择质量合格、未过期的安全套, 不重复使用。远离毒品, 提高对新型“换装”毒品的辨识力, 增强对毒品的警惕性, 了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 如饼干、奶茶、跳跳糖等, 不喝陌生人递来的饮料, 避免误用新型毒品后发生性行为。网上交友、线下见面, 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 避免与网友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认识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等易感染艾滋病高危行为后, 尽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疗机构进行艾滋病检测, 也可采用艾滋病病毒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 自检结果阳性或可疑时, 要及时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疗机构再次检测确诊。如有必要, 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暴露后预防(PEP)用药, 最好在 24 小时以内, 最晚不超过 72 小时。未获得检测结果前, 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预防感染他人。避免醉酒, 更不要在醉酒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 不滥用精神类药物。总之, 要牢记预防艾滋病的要点, 积极学习预防知识, 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艾滋病, 为艾滋病防控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和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 山西省大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英国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所著的《鲁滨孙漂流记》不仅是一部反映欧洲殖民主义向海外不断发展与扩张的早期小说, 同时也是一部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为 18 世纪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 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不胜枚举, 但都绕不开对于鲁滨孙性格的深度剖析。但 21 世纪以来, 学者对于《鲁滨孙漂流记》的评论大多聚焦于大众文化的视野, 尤其是对于人物形象社会教育功能的偏重, 社会教育需求的形象遮盖了文本人物形象的研究, 忽视了鲁滨孙本身形象在资本主义和宗教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所蕴藏的对立及其转化意义。小说集中在“伊甸园”式的荒岛上暗示了这一性格矛盾, 本文旨在深入文本与背景挖掘人物性格的矛盾之处, 通过个体孤独与矛盾的时代特征表现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与宗教、道德等文化观念等冲突, 探究小说的文本人物性格分裂背后所蕴藏着的特定时代的文化症结和困境。

关键词: 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 性格; 困境与抉择

作为 18 世纪英国启蒙主义运动时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已然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和英国帝国扩张时期“旅行写作和探险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读者创造了一个遥远的“他者”概念, 并在对比和干涉中借此输出自我观念, 把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愿望和帝国统治统一编码合法化。同时, 基于人文主义的突显, 这一作品在欧美以外地域的广泛传播中也产生了国内知识分子在外国文学建构民族和主体身份的独特意义, 以至于出现了小说“本土化”的解读和译介, 以此通过文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构。

这一解读和演化当然激发了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之美。从 21 世纪以来, 学者对于《鲁滨孙漂流记》的评论多聚焦于大众文化的视野, 尤其是在作品传播已逾百年的中国, 则更加侧重社会启蒙功用, 以至于该作品大多以儿童版的面貌出现, 而儿童读后感和教育教学设计的文章在当今的文学刊物上也广泛存在。

这种文本解读的努力当然无可非议, 但在这一过程中, 不免会出现对于人物形象社会教育功能的偏重, 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众对于人物性格的深入探究, 一味地强调鲁滨孙英勇无畏、坚持不懈的冒险精神或对其性格背后的殖民主义色彩进行批判, 反而忽视了鲁滨孙在资本主义和宗教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所蕴藏的性格的对立及其转化意义。在鲁滨孙形象的研究中, 笔者认为, 这种对立和分裂则突出表现为鲁滨孙在“伊甸园”式的荒岛中所产生的性格困境和矛盾纠结中, 文化的症结在其中得以彰显, 其最终的抉择也预示着文本背后一个特定

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惯性前进的方向。

一、个体孤独与矛盾的时代表征

在这部小说中, 无论是作品本身, 还是作者本人, 都体现了那个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勇于冒险, 具有鲜明时代精神。但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孤独和焦虑感, 并由此造成了文本的分裂, 这种分裂并非独特的个体所拥有的特征, 只不过是鲁滨孙落入荒岛将其放大化, 在“也许比我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的“伊甸园”里, 读者能够关注到主人公的内心的细微变化, 也因此得以窥见这种性格背后所带来的时代表征。

这一焦虑首先跟他的家庭阶层不无关系,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写道: “1632 年, 我出生在约克市一个上流社会家庭”, 经过转述可以知道鲁滨孙的社会地位属于当时的中间阶层, 是灾祸最少、幸福最稳定的阶层, 既抛去了上层骄奢淫逸、钩心斗角的烦恼, 也避免了下层辛苦劳作、疲于奔命的疾苦。换个角度说, 虽然这一阶层是作者所言最舒适的, 但事实上, 这本身就是人物性格焦虑放大的温床, 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来说, 想要在家庭里知足于平稳恬淡的生活而不去反思几乎是不能的, 因此鲁滨孙“脑子里总想着自己的航海梦”。虽然他本人将其视为冥顽不灵的天性所带来的不幸命运。

鲁滨孙生活的时代是工商贸易的繁荣的时代, 这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商业精神渗透到整个英国社会与之相伴而生。于是, 投机生意、追逐财富成为社会潮流。鲁滨孙也不例外, 在第一次出海遇险后他逐渐淡忘了曾经发生的灾祸, 并在船长朋友的帮助下, 收获了第一桶金, “我不仅成立一个商人, 还成了一个水手。” 而后, 他更是为了获得在巴西的居留证, 成了一个种植园主, 流落到荒岛的那次航海正是为了去交易货品和私贩黑奴。商业贸易的资本主义虽然充满着好处,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的资本主义也面临着许多困惑。鲁滨孙面对的是这个既神奇同时又焦虑不安的世界。他展示了个人主义的敛财心理, 同时, 他必须与所有其他人对抗, 与严酷的现实现对抗。因此他“最终还是无法抵御航海的诱惑”, 选择了航海并最终流落到了荒岛。鲁滨孙这样的寂寞个体, 也自然有了焦灼的心灵, 他一方面竭尽所能地谋取财富, 另一方面又饱受因财富而饱受煎熬。他在荒岛上含辛茹苦, 不辞劳苦地积累“生存财富”。他期望有船只经过以救他于水火之中, 但他又担心来者会对他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当他看到第一个脚印时,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有人来会救他而是会发现他, 于是他垒起了“碉堡”, 甚至在墙外

的富裕社会现实, 鲁滨孙利用当时在荒岛锻造的心理并没有乱下阵脚, 而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地处理财产、安置产业、规划小岛, 并且在一切分派妥当后, 一如既往地追随着自己年轻时的理想, “离开了, 继续自己的旅程”。

在《鲁滨孙漂流记》中, 从个体到国家再到时代, 小说在歌颂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在演绎着时代的矛盾, 这种矛盾不仅仅只是说个人的特殊性, 而是面对时代洪流大众如何做出选择的普遍性。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 使现代西方人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矛盾: 既不能撇开宗教道德对资本主义趋之若鹜, 也不能舍弃现实利益而对宗教纯洁性进行回归。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面对这种社会现状, 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笛福则用一篇趣味盎然的现实主义小说作为媒介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鲁滨孙的漂流旅程中, 这对矛盾同时指向两个既纠缠又消解的方面, 时有转化, 时有冲突, 而他的选择最后也就模糊难辨。但能够判断的, 就是这种性格的矛盾与分裂, 对应的是 18 世纪西方社会个体的焦虑情绪。虽然该作品存在着反映了 18 世纪英国“人类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局限性, 但不否认的是, 在这部充满冒险色彩的小说中, 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时代的现实主义式书写。由此可见, 在分析鲁滨孙的性格困境与抉择中, 我们能够发现, 《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 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漂流, 一个人的心灵漂流, 更是一个时代的困惑漂流记。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M]. 徐霞村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3
- [2] 刘来. 跨越虚实际: 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M]. 宋伟杰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3] 韩杰. 笛福小说中的双重主题与理论困境[D]. 兰州大学, 2018.
- [4] 裴新彦. 鲁滨孙荒岛生存的伦理思想[D].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 [5] 邹黎. 笛福小说清教伦理思想研究[D].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 [6] 张序旭. 《鲁滨孙漂流记》中人文主义精神的探析[J]. 文教资料, 2017.
- [7] 吴森. 《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田园理想研究[J]. 今古文创, 2020.
- [8] 钟鸣. 《鲁滨孙漂流记双重解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0.
- [9] 刘巧萍. 试析《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宗教意识[J]. 赤峰学院学报, 2014.
- [10] 张奕. 从《鲁滨孙漂流记》到《蓝色的海豚岛》看荒岛小说的嬗变 [J]. 大理大学学报, 2020.

(作者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